

由佛入俗 人神共度——盂兰盆会的日本传播与演进

邱丽君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在历代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一直担当着文化输出的重要角色。中国的节日有些被日本照搬使用至今,有些则是被部分吸收后保留下来。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盂兰盆会在与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日本的国情、国民性等方面不断融合、演进后,经由佛事活动变为民间俗事,扎根于民众骨髓,最终发展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规模隆重、声势浩大的日本盂兰盆节。

关键词:盂兰盆会;日本盂兰盆节;盂兰盆舞;农耕文化;祖先信仰

中图分类号:G13.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8)03-0143-05

每一个民族都拥有符合自己风格和特色的节日文化,它是这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孕育的精神财富,是人类生存智慧的结晶。传统节日也是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的载体,支撑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千百年来,也有一些节日已经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退出。如有学者曾指出:“目前,盂兰盆法会在中国还在佛教寺院举办,但民间的盂兰盆活动已荡然无存,中国人已经不知盂兰盆为何物。”[1](P224-225)而在日本,盂兰盆节却是一个可以和春节相提并论的重大节日,同时也是国家法定节日中休息时间最长的节日之一。本文试图分析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盂兰盆会如何经过千余年的不断吸收和沉淀,经由佛事活动变为民间俗事,扎根于民众骨髓,在日本发展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规模浩大的盂兰盆节。

—

日本盂兰盆节由中国传入,经历了多个传播阶段和演进过程。

(一) 中国盂兰盆节随佛教传入日本

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也传入了日本。中日两国有学者认为盂兰盆节在日本传播始于7世纪初,也有一些国内学者认为日本的盂兰盆节是由遣唐使传到日本的。笔者认为,遣唐使将中国盂兰盆节传入日本的提法值得商榷。因为关于盂兰盆节的记载早在公元606年《训读日本书纪》[2](P129)中就已经出现,只能说遣唐使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盂兰盆节在日本的传播和推广。

笔者梳理史料,确认盂兰盆节不是由遣唐使或遣

隋使传入日本的。根据《遣唐使》[3](P202-205)和《遣唐使全航海》[4](P20-24)以及《最新日本史图表》[5](P310-313)记载,推古八年(600年)日本首次派遣隋使到中国。推古天皇(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天皇)在位期间共向中国派遣隋使四次,但在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第一次派遣的遣隋使是否回到日本。第二次派遣的小野妹子于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到中国,推古十六年(608年)和隋朝大使裴世清一同回日本。另外两次派遣的大使也分别于推古十七年(609年)和推古二十三年(615年)回到日本。舒明二年(630年)日本第一次向中国唐朝派遣遣唐使,在舒明四年(632年)和唐朝使者高表仁等一同回日本。由此看,《训读日本书纪》中记载的推古十四年(606年)盂兰盆会比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的时间还要早二十余年,足以证明日本盂兰盆会的传入时间,比史载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时间要早,因此可以断定盂兰盆会最初不是通过遣唐使传到日本。虽然日本在公元600年第一次派遣隋使来到中国,但史料中没有关于遣隋使回国的消息。第二次派遣隋使的时间是公元607年,比史籍中已知最早举办盂兰盆会的时间晚一年。因此,目前也不能断定是遣隋使将盂兰盆会传入日本的。

据《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5 隋唐帝国と日本》记载,公元538年佛教传入日本,得到了苏我氏的大力推广,由此开辟了一条佛教兴隆之路。而以天皇为代表的皇室最初则对佛教采取了静静观望的态度。此后一直到日本第31代天皇用明天皇继位(585~587年)才有了变化。用明天皇曾将丰国(现在

收稿日期:2018-01-10

作者简介:邱丽君(1974-),女,浙江宁波人,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语言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传承河南传统文化对打造全国文化高地的价值性研究”(项目编号:2017B361)。

日本的九州、福岡县、大分县)的法师们邀请到宫中,利用佛教治病,在宫廷中得到好评。公元587年苏我氏开始修建法兴寺,于596年建成,历时九年。苏我氏修建法兴寺的原因在于希望佛法兴隆。于是贵族们纷纷效仿修建个人寺院,佛教在部分贵族中兴起。这些贵族通过佛教祈求现世和后世的安康,其中后世涉及到祭祀七世父母和祭拜祖先,因此围绕祖灵而举行的盂兰盆会在寺院中开始举行[6](P109-115)。

由上可以推断,最初盂兰盆会是随佛教传入日本的,但皇室对其采取观望态度,并未积极吸收盂兰盆会文化。用明天皇“请僧入宫”成为日本佛教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天皇允许佛教进入宫廷,皇室由最初对佛教的观望变为开始尝试接触佛教,为佛教进入日本皇室打开大门。之后推古天皇在日本历史上首次派遣大使到中国,加大了佛教的传播力度。部分贵族为祈求现世和后世的福禄,开始修建寺院,同时举办盂兰盆会祭拜先祖。皇室及贵族们对佛教的信仰加快了盂兰盆节的传播。

(二)平安时代的日本盂兰盆节

日本关于盂兰盆节最早的记载出自《訓読日本書記》,书中记述了推古天皇在推古十四年(606年)“四月八日和七月十五日设斋”[2](P129)。文中所述的“七月十五日设斋”可以肯定是举行盂兰盆节的活动。只是当时虽然设立了仪式活动,但此处并没有出现“盂兰盆节”以及“盂兰盆会”一词,估计是当时其规模和影响不够大。该书另有记载:“齐明天皇三年(公元657年)七月十五日,在奈良飞鸟寺的西边制造了须弥山像,并举行了盂兰盆会。”[2](P264)这里首次出现了“盂兰盆会”一词。“齐明天皇五年(659年)七月十五日这天,京都内各大寺院都在讲颂《盂兰盆经》,将七世父母解脱苦海,并称此举为超度七世父母,为父母积福添寿。虽说如此,但劝讲《盂兰盆经》才是举行盂兰盆会的最终目的。”[2](P275)公元659年七月十五日,天皇召集群臣来到京都,在寺院中诵读并讲授《盂兰盆经》,为报七世父母的恩,超度七世父母。这一举动标志着天皇开始积极参与盂兰盆会活动。

据《続日本紀》记载:“天平五年七月六日,开始命令大膳职准备盂兰盆祭。”[7](P192)“大膳职”是日本宫廷掌管饮食的部门。天皇于天平五年(733年)命令宫廷内部准备盂兰盆节的贡品,标志着盂兰盆节作为一年的例行公事已经开始被皇室认可。随后日本的一般贵族也开始参加盂兰盆会的仪式活动。此后,盂兰盆会开始由在少数上层阶级个人所属的寺院中举行普及到全国各个寺院。编于967年的《延喜式》记载,盂兰盆会在日本平安时代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每年日本朝廷官员都会按照所定规格检查寺院准备盂兰盆会

的情况。一直到平安时代盂兰盆会已逐渐演变为固定的公事活动[8](P1032)。

《今昔物語集》是11世纪日本平安时代的说话集。该书记载说,在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当天,一位极其贫困的女子因没有能力为父母准备盂兰盆贡品,于是脱下自己的外衣作为贡品放在瓮中,上面盖上莲叶送到爱宕寺,在莲叶上写到:“三代的佛祖,虽然我献上的东西仅如莲叶上的露水一样少,还请佛祖能可怜我,保佑我的父母。”这是对当时民间盂兰盆会生者向死者供奉贡品的具体描写[9](P60)。

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蜻蛉日記》[10](P27)和《枕草子》[11](P58)中都有描述百姓参加盂兰盆会活动的场面。由此可见,盂兰盆会由最初的纯佛教活动,逐渐发展为官方和民间共同举行的惯例风俗活动。

(三)镰仓时代、室町时代的盂兰盆节

日本在镰仓时代陷入长期战乱之中,随着各地大名纷纷崛起,日本进入军阀混战的战国时代。由于经济衰退、政治动乱,许多寺院无力定期举行盂兰盆会,民间开始盛行在家里供奉祖先和已逝父母的活动,这种活动更接近于现在的盂兰盆节活动。如贞和五年(1349年)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中原师守在日记中记载:“今天早上为供奉父母和觉妙、妙心两位姐姐,准备了四人的供品,将筷子竖起来。”[12](64卷卷29)可见,当时的盂兰盆会已由最开始的在寺庙里进行,演变为也可以在家中对死者进行供奉的活动。

室町时代前期的醍醐寺座主满济的日记《満濟准後日記》(又名《法身院准後日記》)中记载作者于应永二十年(1413年)七月十四日参拜了菩提寺的墓地,在七月十五日抄写了《盂兰盆经》,然后和众人一起朗读《盂兰盆经》,并为众人进行讲解[13](P633)。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扫墓已经作为盂兰盆会活动的一部分。盂兰盆会的活动不仅限于寺庙,在家里抄写《盂兰盆经》和众人朗读讲解《盂兰盆经》等都已列入民间百姓的盂兰盆会祭祀活动中。

(四)江戸时代延至近代的盂兰盆节

日本进入江戸时代后,政治逐步稳定,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盂兰盆节由单纯的祭祖活动变为被民众认可的节日。

《江戸東京歳時記》中称:“盂兰盆节是七月最重要的家庭祭祀活动之一,七月初是祭奠灵魂的时节。因此,在盂兰盆节举行将祖先迎接到家中,祈祷后并送走的仪式。”[14](P123)该书并记载,从公元1801年到公元1804年日本盂兰盆节设立了“草市”(出售盂兰盆节用品的市场),在13日早上举行。记录的1803年“草市”主要有“浅草駒形、門跡前、茅町、筋違広小路、麹町、両国広小路、日本橋南北、人形町、深川森下町”等

分布在东京的几个地区[14](P129)。书中还有关于“迎火”的记载。“到了七月十三日的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点燃迎火,将土锅放在地上,然后在上面点燃麻秆,这是江户东京点燃迎火的方法。”“结束为期三天的盂兰盆节,到了十五日傍晚是送祖先的时候,也有在十六日早晨送祖先的,送火和迎火相同,将先祖用火迎来,再用火送走。”[14](P131)

根据《江戸東京歳時記》的记载,看出盂兰盆节在日本江户时期已经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其中不但有送迎祖先的活动,更为百姓购买盂兰盆节的用品专门设置了“草市”,对送迎火甚至点火的材料以及器具都有规定,这些和日本现今的盂兰盆节仪式活动内容相当。盂兰盆节此后也成为日本法定的节假日,并且是日本除春节以外放假最长的一个节日。

二

盂兰盆节文化在日本代代相传、演变较大,其传承不息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 由佛教活动演变为皇宫贵族礼仪活动

盂兰盆节文化之所以能在日本代代传承下来,首先和日本皇室对佛教的崇拜及盂兰盆节活动的重视有密切关系。如上文所述,在由苏我氏为代表的贵族信佛建寺时,日本天皇开始接受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盂兰盆节文化,并在当时日本最古老且具有代表意义的寺庙——飞鸟寺举行了盂兰盆会,从而确立了盂兰盆节在日本的地位,之后盂兰盆节的仪式活动便成为日本佛教中必不可少的活动。据《訓読日本書記》的记载可以看出,最初传入日本的盂兰盆节文化在日本的寺院得以传播,主要是供养十方众僧、为过世的父母祈福脱离苦难,往生极乐世界,以及为现生的父母添福加寿的一种活动[2](P129)。

从《訓読日本書記》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盂兰盆会虽然得到天皇的认可,但当时的盂兰盆会仪式活动还未列入宫廷仪式活动。目前所知,“天平五年(733年)七月六日,开始命令大膳职准备盂兰盆祭”,标志着盂兰盆节开始由佛事活动发展为皇宫例行活动。至公元10世纪,盂兰盆节仪式活动在日本的皇宫和寺院同时进行,已具有一定规模。《延喜式》一书曾详细列出了盂兰盆会所需要准备的食物清单:“各寺院供奉食品的清单,米一斗四合,糯米两斗,糖三升,黍米五升,小麦一斗四合,熟瓜三十六个,青瓜一百一十个,茄子两斗等等。”[8](P1059)这些食物清单和七夕节的所需供品一样。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盂兰盆节仪式活动在10世纪末时和七夕节活动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盂兰盆节仪式已经成为平安时代皇宫和寺院的国家法定仪式。

到了平安时代末期,盂兰盆节仪式不仅在皇宫和寺院举行,在一般贵族阶层之间也开始大规模举行。

公元794年至1183年日本正处于以贵族为政治中心的贵族社会阶段,藤原道长把贵族权利推到顶峰,统治朝廷三十余年,达到了“此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的境界。在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閔白記》中对贵族间举行盂兰盆祭祀活动有详细记载。如宽弘七年(1010年)七月十四日的记录:“盂兰盆仪式照常进行,即使是服丧期间,脱去孝服,可以去宫中参拜。”[15](P215)再如,长和四年(1015年)七月十四日:“法兴院、净闲寺、慈德寺等按照惯例举行盂兰盆祭祀活动。”[16](P114)从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閔白記》中可以推断,在藤原道长时期(966-1027年),贵族开展盂兰盆祭祀活动已成惯例。连位高权重的藤原道长在七月十四日也要向法兴寺送盂兰盆节的贡品。另外,盂兰盆节期间即使服丧也可以脱去孝服去宫中参拜的这一规定也说明了盂兰盆节在藤原氏统治时期已经超越其它节日,在皇室和贵族之间拥有特殊地位。连日本服丧期间不能进宫参拜或是参加节日庆典活动的规定,也要为盂兰盆节开放绿色通道。盂兰盆节的特殊地位使其仪式活动由皇宫向一般贵族阶层之间迅速传播。这与当时贵族掌握朝廷大权,藤原氏专权达到全盛时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彰显贵族的权利,皇宫具备的礼仪和仪式活动,贵族们也纷纷效仿,盂兰盆节的祭祀活动在这种大环境下得到了推动和传播。

(二) 日本人的祖先信仰对盂兰盆节的影响

日本人的祖先信仰使盂兰盆节不仅仅是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成为日本人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它使盂兰盆节从影响日本人的生活,最终融入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中。

日本人思想中存在着身体和灵魂分离论,相信人死后灵魂还在。因此,日本人死后一般被葬在离家不远的寺院中,这样每天家里人出门时都能经过看到。他们认为亲人葬在家的附近可以庇护子孙后代。“刚去世的人的灵魂通过祭祀和供养的才能变为保佑家人的祖灵,没有经过子孙后代的祭祀和供养刚去世的灵魂带有污秽,不能成为祖灵,也不会保佑后代,只有接受后代、子孙的祭拜才能使这些新的灵魂稳定下来,经过不断祭祀供养成为保佑家人的祖灵。”[17](P100-101)因此,中国的盂兰盆节传入日本后,经过日本人自身对灵魂的特殊理解,与信仰中的“祖先观念”相结合,就演变为现在的迎接祖先和送祖先的仪式。

日本人的祖先信仰对盂兰盆节祭祀方式有着直接影响。现今民间举行的盂兰盆节仪式活动主要围绕盂兰盆节期间接送祖先的灵魂来举行。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将阴历(旧历)改为世界通用的阳历即新历,但在农村,却没有立刻将旧历改成新历,一直沿用了很久。主要是因为一年中的祭祀活动是按照旧历来排列

的,如果改为新历的话,祭祀活动的日程就会提前一个月左右。后来,人们采用了便利的方法,将所有旧历中的节日在新历中都推后一个月进行。于是原本旧历七月的盂兰盆节的日程按新历也推后一个月成为了现在的8月。根据地方、地区的不同,一般在8月13日正式开始,称为“迎盆”即接祖先归来,15日或16日结束,称为“送盆”即送祖先回去。

在日本的农村,为了方便祖先的灵魂顺利地进入村庄,首先进行除草活动,主要清除从祖坟到自家门前的杂草。另外准备桔梗、天香、百合等供奉在佛像前的盆花,制作室内佛龕前摆放供品的盆架,上面放上竹竿,将这个季节里收获的各种各样的蔬菜挂在一起。8月13日晚上,人们在家门前点燃晾干的麻或马科莫等迎接祖先的灵魂,点亮“盆提灯”,为祖先的灵魂领路。各家各户的佛龕里摆着故人喜爱的水果、点心和酒等物品。在佛龕前摆放茄子做的牛和黄瓜做的马,这是各地区的共同习俗。日本人认为祖先的灵魂是骑黄瓜做的马来到人世间,用茄子做的牛回到那个世界。骑马来寓意了日本人盼望祖先早些归来的急切心情。坐牛车慢慢地去,体现了日本人对祖先依依不舍的感情。同时祖先回去时要带上子孙为其准备的丰厚礼物,因此选用牛车拉回去。

日本盂兰盆节期间的活动也有许多习俗要求和祖先信仰有关。比如不允许杀生,连小孩在盂兰盆节收集昆虫标本也会被家长责骂。因为日本人相信在盂兰盆节时,祖先的灵魂会借用其它生物的身体回到家。另外,因为祖先15日会去神田购物,需要为他们准备钱,一般日本人把钱放在“精灵棚”的“马”背上。这天晚上的盂兰盆舞会上,表演者要头戴斗笠,并用斗笠遮住脸,展现出祖先的灵魂回到了家乡,并在子孙当中欢歌笑语的样子。

8月16日是祖先回去的日子,为了送走祖先的灵魂,人们在门前进行“送火”活动。各地都有大规模的送迎活动。在日本以“送火”出名的是京都举行的大文字五山送火活动。由此可以看出盂兰盆节的整个仪式活动都是围绕送迎祖先的灵魂来进行。这和日本人信仰中的“祖先观念”“祖先信仰”丝丝相扣,正是因为相信祖灵在子孙后代的拜祭下能保佑子孙、庇护后代,盂兰盆节的仪式活动才会围绕祭祀迎祖进行,并且能传承下来。

(三) 日本经济发展给盂兰盆节赋予了新的使命

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时期,也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后政治安定,经济也有所发展。伴随着社会稳定,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从农村到城市经商和打工的人们虽然工作繁忙,但绝大多数工作单位还是会允许在每年的春节

和盂兰盆节期间休假两次。江户时代甚至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允许已出嫁的女性在正月和盂兰盆节回娘家。而对于每天在外务工的人员来说,春节和盂兰盆节是他们最为期待的两个节日。每当盂兰盆节前,寻常百姓一般都会全家出动为盂兰盆节做准备,可以说盂兰盆节就是家庭成员一次宝贵的欢聚时刻,而对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来说,这就是一个热闹而欢乐的节日。

日本人的这种习惯一直持续至今。现在每逢正月和盂兰盆节放假时,从乡村出来到城市工作的人们就会回老家,形成一年中的返乡高潮。这种正月和盂兰盆节回家的习惯,就是保留了江户时期规定的春节和盂兰盆节休假回家探亲的习俗。现代盂兰盆节的风俗习惯基本上也是江户时代的延续和补充。

日本的盂兰盆节活动是以一家之主及其成员为中心,包括亲戚在内举行的活动。现代繁忙的工作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使家庭成员、亲戚之间在一年当中都极少有机会见面,而一年一度的盂兰盆节使大家能够抽出相同的时间借此相聚。在盂兰盆节回去共进晚餐,一起对祖宗牌位进行拜祭,大家抱着共同的心愿扫墓。8月的日本是一年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正值学校放暑假,带孩子一起参加盂兰盆仪式活动,带着他们一起购置盂兰盆节用品,帮助准备招待亲戚的盂兰盆节饭菜。对于孩子们来说,跟随父母去农村老家为祖先扫墓,参加盂兰盆节仪式活动也是新的体验。通过盂兰盆节祭祀活动的准备工作,孩子对祖先和家族有更深的了解,并产生了深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由此一来,一代又一代人从最初的参加逐渐演变为以后的继承,盂兰盆节文化也就得以传承下来。

(四) 盂兰盆舞推动盂兰盆节在日本的传播和传承

日本的盂兰盆节虽然由中国传入,但中国传统的盂兰盆节却没有跳盂兰盆舞的传统。在盂兰盆节期间跳盂兰盆舞是中日盂兰盆节祭祀活动的一大不同之处。日本最早关于盂兰盆舞的记载是室町时代禅僧的《大日本古記録蔗軒日録》,文明十八年(1486年)七月十四日“夜间敲鼓击钟之声和唱阿弥陀的声音惊天动地,这是当时的风俗”[18](P209),人们高声念佛,围着跳舞,被日本人称为“念佛舞蹈”。由最开始的“念佛舞蹈”,发展为民间的娱乐活动,随后又和供奉亡灵的盂兰盆活动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盂兰盆舞。

从“念佛舞蹈”发展而来的盂兰盆舞是为了表达遵循释迦牟尼的教诲将母亲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喜悦,并以跳舞的方式安慰祖先的灵魂。盂兰盆舞会逐渐演变成给祖先灵魂送行仪式的一部分。特别是为了安慰新盆的灵魂,家家户户习惯围绕有新盆的家庭跳舞,搭建高台,装饰灯笼,跳舞到深夜。日本至今仍有

许多地方传承延续盂兰盆舞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日本德岛县的盂兰盆舞“阿波舞”(德岛县原名阿波国,故名)。“阿波舞”主要由日本三弦、大鼓、笛等来伴奏,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组成一个个团队边跳边唱、边前进。当天舞队经过的街道一切车辆禁行,专供跳舞使用。“阿波舞”一般是从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下午六点开始,到晚上十点左右结束。舞队经过之地灯火通明,亮如白昼。人们提前占座位争相观看,场面颇为壮观。舞蹈的动作源于日本舞蹈,虽简单又不失和谐。参加者从幼儿园的孩子到六七十岁老人各种年龄层次的都有。虽然祭祀祖先是为了寄托对祖先的思念,但在日本人眼中,他们把送迎祖先当做一件快乐的事,因为祖先回到家里能够全家团圆。

盂兰盆舞会在日本的传播也无形中推动了盂兰盆节文化的当代传承。据日本 NHK 新闻报道,2017 年 8 月 5 日东京“涩谷第一届盂兰盆节舞会”参加人数达到 34000 人。舞会中妇女团体联谊会的代表在上面做示范,普通女性则在下面穿和服围着鼓楼跳盂兰盆舞。会场中一直播放着日本跳盂兰盆舞的代表曲《東京音頭》和《碳坑節》。此外,为迎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主办方还特别播放了《東京五輪音頭 - 2020 - 》。举办方称此举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让日本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盂兰盆舞使日本的盂兰盆节细雨无声地浸透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让日本人的生活和盂兰盆节文化紧紧相连难以分离。近年来,日本政府还通过在首都中心地带举行大规模的盂兰盆节舞会,来巩固盂兰盆节在

日本的地位,让日本盂兰盆节文化在最大范围得以传播和传承,期望借此使日本的盂兰盆文化得到更多人的了解。

三

通过以上对日本盂兰盆节的发展和演变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由中国盂兰盆会演进而来的日本盂兰盆节和中国的“鬼节”“中元节”不仅名称上存在不同,更为明显的是中国的“鬼节”“中元节”已渐渐被民众所遗忘,而日本的盂兰盆节却代代相传、经久不息。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基于对他国先进文化的崇拜,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礼仪等,并在宫廷中效仿使用。随后,日本历史上又经历了以贵族为政治中心的贵族社会阶段,因此盂兰盆会的祭祀活动也由宫廷走入一般的贵族家庭以及其亲朋好友、周边所接触的人群。其二,日本人的祖先信仰不但直接影响着盂兰盆节的仪式形式、祭祀对象、举行时间等,还使盂兰盆节文化逐渐演变成为日本人的重要精神支柱,成为日本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动。其三,日本政治的稳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给盂兰盆节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盂兰盆节由民间活动变为法定节假日。如今,日本的盂兰盆节是被日本官方认可并深深扎根于民间的公事活动。在吸收中国的盂兰盆会文化的同时,日本将自身的风俗习惯及信仰追求融合其中,不但保留了自己的主要制度和价值标准,而且使重组后的盂兰盆节文化在日本能够深入人心,传承不息。

参 考 文 献

- [1] 梁霞. 浅论唐宋时期佛教盂兰盆会的民俗化[J]. 文学界, 2012, (7).
- [2] 黑板勝美. 訓読日本書記: 下卷[M]. 東京: 岩波書店, 1939.
- [3] 東野治之. 遣唐使[M]. 東京: 岩波書店, 2007.
- [4] 上田雄. 遣唐使全航海[M]. 東京: 草思社, 2006.
- [5] 外園豊基. 最新日本史図書館表[M]. 東京: 第一学習社, 2013.
- [6] 井上光貞. 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 5 隋唐帝国と日本[M]. 東京: 学生社, 1981.
- [7] 続日本紀經濟雜誌社, 続日本紀, 国史大系: 第 2 卷[M]. 東京: 濟雜誌社, 1901.
- [8] 全国神職会・皇典講究所. 延喜式: 下卷[M]. 東京: 大岡山書店, 1932.
- [9] 近藤圭造. 今昔物語集: 卷第 24[M]. 東京: 近藤活版所, 1882.
- [10] 物集高見監修. 蜻蛉日記, 校註日本文学叢書: 第 4 卷[M]. 東京: 広文庫刊行会, 1918.
- [11] 北村季吟・抄鈴木弘恭訂正増補. 枕草子, 枕草子春曙抄[M]. 東京: 青山堂, 1893.
- [12] 中原師守. 師守記[M]. 東京: 国立国会圖書館.
- [13] 満濟准後. 満濟准後日記[M]. 京都: 六条活版製造所, 1920.
- [14] 長沢利明. 江戸東京歳時記[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2001.
- [15] 藤原道長. 御堂閔白記(上)[A]. 正宗敦夫. 日本古典全集[C]. 東京: 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 1929.
- [16] 藤原道長. 御堂閔白記(下)[A]. 正宗敦夫. 日本古典全集[C]. 東京: 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 1929.
- [17] 柳田国男. 先祖的话[M]. 東京: 角川文庫, 2007.
- [18]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 大日本古記録蔗軒日録[M]. 東京: 岩波書店, 1953.

(责任编辑 郑良勤)